

古籍保护

专刊



3-6 版

专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英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专题策划

“她力量”

古籍领域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

编者按 在古籍保护领域，“她力量”正以不可被忽视的姿态彰显着自己，与“他力量”一起，凝聚成“我们的力量”。不管是普查、修复，还是宣传推广、展览展示、整理馆藏等，她们都冲锋在前。她们以青春的姿态投入到所热爱的文化传承事业中，她们以行动书写着时代的华章。本期特邀不同岗位的女性古籍保护工作者书写自己的古籍故事，让我们一同走进“80后”“90后”的她们，感受她们奋斗的青春，以及对古籍工作的无悔付出。

从热爱中汲取力量，在岗位上奉献青春

□吕婷婷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

2011年，我怀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硕士毕业后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光荏苒，转眼间便已度过十多年的光阴。

迅速完成角色转换

国家图书馆对新员工有着系统科学的培养体系，使得我们从初入社会的大学生快速成为进入工作角色的图书馆员。2011年，我入职古籍馆善本特藏阅览组。8月，刚入馆的我们，便赶上了当时国图一期修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本外迁。二十余万册件善本，有条不紊地经过下架、排序、整理、打包、装箱等工序，分步骤、分阶段陆续进入暂存区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加入其中，同珍贵典籍有近距离接触，在较短时间内较为系统地了解国图的古籍馆藏，为日后从事业务工作打下基础。同时，在搬迁过程中，部处领导和老师同事通过言传身教、“传帮带”，向我们强调了善本

藏品安全第一，普及了古籍保护知识，教导了工作方式方法。同时，馆里为新员工安排了一系列培训课程，由各部门主任和专家学者亲自授课，历数国图历史、馆藏分布、业务概况、工作方法等，让初出茅庐的我们较快进入角色并适应图书馆工作需求。在理论授课后，我们开始基础业务部门的轮岗，我先后在阅览部、中文采编部轮岗，接待读者、整理馆藏，对基础的采编阅藏工作有了总体了解。正是通过善本搬迁、新员工课程和业务轮岗，让我在之后的数年中，能够有条不紊地在古籍馆参与库房管理、阅览服务、古籍整理、善本回迁、文津阁《四库全书》前整理，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努力成为“多面手”

2016年，因工作需要，我调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担任部处文书。文书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不仅体现部门工作面貌和工作

作风，还直接关系到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我认真学习规章制度，努力向前辈学习，注重上下通达、左右联系、互相协调、换位思考。文书工作头绪多、时效性强，在部处工作人员少的情况下，作为年轻人，我获得了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的机会，先后参加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第一期文艺工作者培训班、国家图书馆文书暨兼职档案员培训，得到多方位的锻炼，兼任档案管理员、网络系统管理员，先后担任安全员、宣传员。因为所在部处也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办事机构，我参与了协会年度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文化志愿服务、技术装备展示、技术研讨会等会务实施工作；独立承担“99公益日（腾讯）·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社会公募项目策划、对接、运作、推广；参与协会合作举办的全国性培训活动计10余期，承担报文、

招生、课业辅导；参与策划、培训组织、宣传推广等工作，努力成长为业务“多面手”。

为了传播知识、宣传典籍，近年来，我还结合所学专业特长，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发表若干与业务工作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文旅·融合·创新——首届海淀区研学旅游季征文”一等奖、国家图书馆青年学术论坛二等奖等，并任《海峡两岸中华古籍保护论著提要》执行编委。

2022年的工作展望

新的一年，我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不断学习奋进、努力提升能力，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此，邀请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伙伴们，进入中华古籍保护事业，让更多的青春力量加入传承保护古老典籍的活动中，相信一定能迸发出令人欣喜的光芒。



吕婷婷，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文书。中国传媒大学古代文学硕士，2011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参与了库房管理、阅览服务、古籍整理、善本回迁、文津阁《四库全书》前整理。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处工作中，得到了项目策划、组织培训、推广宣传，以及档案管理、网络系统管理等多方面的锻炼，已经成长为业务的“多面手”。

我为西文古籍修复代言

□胡瑾 HG书籍装帧工作室

与西文装帧、修复的缘分

我从2007年开始进入西文装帧的领域，但进入西文古籍修复是从2015年开始的。

2015年我去了欧洲和美国，跟着不同的老师学习西文装帧的技术，也学了一些和修复有关的知识，但学到的知识比较有限，也很零散。

2019年，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邀请了来自美国装帧学院的两位老师：装帧大师 Monique Lallier 和修复大师 Don Etherington 来复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教学。他们是夫妻，同时也是我之前去美国短期学习时的老师。我也因此有幸担任 Don 老师修复课程的助教，跟着老师系统而详细学习了西文修复的方法和技术。

2021年9月，受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的邀请，我开始担任“西文古籍修复”培训班的老师，这是为期两周的系统修复课程。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2021年10月，我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与上海天文博物馆（佘山天文台）联合的西文修复教学研究修复项目的主讲导师。

对西文古籍修复行业的观察

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事古籍修复尤其是西文古籍修复的人才极为短缺。对于修复师而言，最稳妥的方式是进图书馆等机构工作，才能有稳定的收入。如果自己经营修复工作室，维生的压力会很大。修复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选择在图书馆、博物馆求职，但是竞争压力很大，就业前景并不好。

古籍修复不同于其他的文物修复，因为书籍作为纸质文物，和其他文物相比，价格相对低很多。就我所从事的西文修复领域而言，修复一本书所需要的时间和材料成本，往往高于书本身的价格。其实市场上，有许多等待修复的西文古籍和现代纸质文献，但是修复成本

实在太高。一方面有很多待修复的书，一方面人才又不足，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西文古籍修复的现状。

我个人认为，古籍修复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行业，而是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甚至是民间团体持续提供资金支持的“文化遗产”项目。

对西文古籍修复原则的理解

我认为，修复的方法和结果，需要根据不同收藏者不同的修复目的进行调整。比如给私人藏家做修复的时候，原则是尽量看不出修复的痕迹，我们要做“艺术性修复”；给机构图书馆做修复的时候，不能过度掩盖修复痕迹，而是要保留书的原始信息。上面两种，并没有孰优孰劣，不能说能看出修复痕迹，就是修复水平不够。

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修复师都应该对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书的情况进行文字和图像的记录，修复中所用到的材料都要尽量无酸、可逆，并且不在原件上进行全

色（不修改古籍的原始信息）。

2022古籍工作计划

2022年我将继续协助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天文博物馆的西文修复项目，并将第一期的成果集结成册，供大家交流；9月，继续在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教授“西文古籍修复（初阶）”；根据自己在培训班上教的内容，写一本教材，将自己所学的，所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促进中西方在西文古籍修复方面的交流，如邀请西方在修复和装帧领域的从业者专家，协助图书馆开展“西文装帧和古籍修复”线上研讨会和系列讲座；与上海 MUJIBOOKS 合作，定期向书店的读者宣传西文古籍修复的技术基础，教大家怎么科学地清洁、保护、保管书籍，同时也积极宣传书籍装帧和古籍修复行业，让大众了解书籍装帧和书籍修复背后，所需要的流程、技术，提高大众对修复专业性的了解。



胡瑾，西文书籍装帧师和西文古籍修复师。2007年开始进入西文书装帧领域，2015年赴欧洲和美国学习西文装帧和修复，目前经营一家西文装帧修复工作室：HG书籍装帧。多次承担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等举办的“西文古籍修复”培训班讲师。

“理工女”在古籍领域的业务成长

□刘炳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善本特藏典阅组



刘炳梅，曾专业学习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是标准的“理工女”，2015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历经古籍善本特藏阅览室、古籍书库管理员等岗位。多次参与大型古籍展览布展撤展工作。

我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毕业的，2015年来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时对善本、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等一窍不通。凭着对历史、古籍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我这个理工女在古籍馆慢慢成长，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服务读者，古籍知识体系建立与专业背景相结合

刚入职时，我在古籍善本特藏阅览室工作，通过部门培训、同事专家指导等理论学习，经过解答读者咨询的实践检验，我从古籍学术小白成长为业务小能手，对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稿本、刻本、活字本的基本特征有了初步认识，对古籍原件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有了切身体会。我见证了古籍馆阅览室逐步对公众开放古籍原件阅览申请、中华再造善本的惠及士林、中华古籍资源库的数字资源猛增和免登陆升级。我也在古籍纸张成分、纤维素木质素含量配比、杀青抄纸工艺流程等方面找到了自身专业和古籍管理保护工作的结合点，例如：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的知识可以助我处理古籍保护

中纸墨保存、防虫鼠、防霉菌的问题，气相色谱、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能分析古籍书库中空气和纸张成分等。知识学习越多，越知道古籍存藏至今的不易，越觉得古籍保护的重担之重。

书库管理，脑力与体力的双重锻炼

转岗至古籍书库工作后，我吸取在阅览室的工作经验，从读者使用角度丰富了馆藏古籍目录表，在古籍版本、存卷、版框尺寸、页数等项目上做了信息整合，既减少古籍原件的翻动，又解答读者研究之困惑，实现书库管理、阅览室和读者的信息共享联动。之后有幸参与了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的清点盘库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男员工属于稀缺资源，这项工作都是由女馆员完成的。例如清点一万六千余件的敦煌遗书时，两个女生每天要开两三百个木质轴盒，拇指、食指和手腕都麻了，念书号和数量的人说话嘴瓢了，做记录的人手抖到甩胳膊，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盘点就比较有趣了，采用的一个85后女生PK

两个90后女生的战术，85后女生脚蹬书梯爬上爬下开合6144个木函，90后女生手敲键盘或加或乘统计36304册古籍。两周下来我最终体力不支，败在钱伊诺、陈虹二人的轮留上阵之下，但是也以严谨细致、吃苦耐劳的盘库态度获得了同事间的革命友谊。

展览布展，考验与提升并举

我的工作还包括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古籍相关展览布撤展及点交工作。2019年9月举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是我参与规模最大、珍贵古籍种类数量均最多的布展交接工作，涵盖了敦煌遗书、早期佛经、金石拓片、宋元善本、明清古籍、少数民族古籍、古地图等三百余册件，四个展厅联动，既涉及馆内部门间的责任权属交接，又要配合馆外单位古籍展品的协同布展。大型展览是对自己这几年业务能力的检验和提升，也是与馆外同行专家交流和学习经验的好机会，受益匪浅。

疫情面前，独立出差撤展

2020年5月“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

文献展（深圳南山博物馆巡展）”的撤展运输工作正处在深圳疫情严防严控阶段，为了保证《永乐大典》在内的20余种古籍安全运送回馆，且尽量减少人员远距离流动，领导们没有沿用“展览负责人、古籍业务人员、保卫干部”三人为一团队的常规组合，而是安排我从北京出发往返深圳完成古籍撤展、点交、包装工作和个人返京居家隔离，文物运输公司在深圳对接押运古籍进京、回馆直接冷冻杀虫静置杀菌14天、开包装点交入库的方案。因为我既有古籍点交、布撤展经验，又全程参与了该展览的前期准备和深圳布展工作，还具备一个人居家隔离条件。当看到馆里准备的口罩、护目镜、消毒物、以及费了好大劲弄来的医用隔离服时，我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图书馆这一坚强后盾的贴心关怀，最终不负众望完成任务。

随着图书馆业务的不断扩展，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在女员工为主的岗位上，“巾帼不让须眉”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每天的日常，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女汉子。



汪帆，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师。2008年进入古籍修复领域，并热衷传统手工纸实地寻访。出版有多部有关纸质文献修复著作。2022年，她的寻访传统手工纸著作《寻纸》即将出版。

2008年2月，刚入修复行业，我，前往北京参加“古籍修复技术基础培训班”。长长的75天培训，余暇时，我总爱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堂入室于古色古香、文化气息极其浓郁的店家、铺子。记得有一回，一位瓷器店老板好奇地猜我是干啥行当的，猜了一圈也没猜到。当得知我是古籍修复师时，她猛一击掌：“哦，我知道了，就是在那故宫里头儿修屋顶的吧？真厉害，女汉子！”

整整14个年头过去了，随着纸质文物保护和宣传力度越来越强，加之继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2020年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6集纪录片《古书复活记》，以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书山有路》直播系列，古籍修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一波推一波，一

浪高一浪。现在如果提起古籍修复，恐怕不会再会闹出那位瓷器店老板类似的笑话了吧？这是古籍修复宣传、普及的力量所致，也许还有“我力量”的功劳呢。

最近，多年未见的小学同学聚会。交谈结束后，有一位同学不无感叹地跟我说：“小帆，你知道吗，我们在饭桌上聊房子、车子、孩子、股票时，你的存在感几乎是零。但我们问到你的工作，你一下子滔滔不绝，就像个发光体一样，把我们都吸引住了。”他说的这些话，我相信是出自内心的感受，因为不止一个人这样对我说过了。2018年12月，受姚伯岳先生邀请，我前往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与研究生们一起交流古籍修复纸张的应用问题。返程途中，一名学生发

微信告诉我，讲座让她很有收获，“真正热爱事业的人说起她热爱的事儿，整个人都有一种发光的感觉，既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倾听的我们”。是啊，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把它融到我们的血液里去。这应该就是“我力量”的原动力吧。

除了古籍修复的本职工作外，我也热衷于传统手工纸的实地寻访，并把寻访经历诉诸文字。从2019年在《藏书报》开办“小帆说纸”栏目，截至2021年，先后发了近三十篇。说纸的文章越说越长，却总是意犹未尽。于是有了即将在今年出版的《寻纸》一书。我在给该书写后记时，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其实这种孤独感，曾经无数次徘徊在我寻纸的历程中。这种孤独，出现

于迷路在西藏无人区时；出现于太行山谷中独自行走时；出现于在长沙患病咳嗽，每天还要挣扎着驮上大背包早出晚归地奔波时；出现于被大巴车司机半途扔在异乡的国道上，不知何去何从。除此之外，还有纸坊主人相见之初那不解、疑惑、防范、婉拒的神态……但是，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坚持以谦和、共情的态度，去体验中国传统手工纸生产者的执着、热忱和情怀。结果，孤独反成了跋涉者一种独特的享受。也许，这就是“我力量”吧。

每一个古籍保护工作的从业者或关注者，就如同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小雪花，凹凸有别，却合而为一，作为个体，犹如那一抹“微光”，凝集一处，却是无比地耀眼。

微光的力量

□汪帆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葛小禾，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进入古籍保护领域已5年。参加安徽省古籍普查工作，还曾担任“2019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安徽行”的指导老师。多次参与策划古籍宣传推广活动。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安徽师范大学读研时期就接触到了古籍文献，专业系统地学习了古籍的基础知识，也让我对古籍保护工作产生了兴趣。毕业后，我如愿考入安徽省图书馆，被安排到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工作，至今已有5年时间。

刚工作时，我对古籍的认知还仅停留在书本上，很少有机会亲手翻开古籍、深入了解古籍。随着安徽省古籍普查工作的逐步推进，我也更多地参与到了古籍保护工作中，不断在普查中积累经验，丰富古籍保护知识。5年间，我赴8家基层古籍收藏单位开展

普查普查登记与文献整理，担任过“2019年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安徽行”的指导老师，审校7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数据，从初步的文献整理到能独立完成古籍普查，从协助古籍普查到帮助指导别人完成古籍普查，实现了由古典文献学学生向古籍保护工作者的角色转变。

除了古籍保护业务工作外，我还承担着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综合事务处理工作，这也给了我全面了解全省古籍保护工作全貌的新角度。几年来，我通过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的日常工作，与各基层古籍收藏单位有较多沟通交流，逐渐理解了古籍保护的深刻意义，也认识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2019年，安徽省积极参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的“馆长晒宝”活动，我详细查阅资料，撰写馆藏明万历周孔教校刻本（四库底本）《韩非子》的相关文稿，向公众普及珍贵古籍的文献价值。2020年，我与同事一起策划了《重阳驱魔记》文化宣传片与“晒传统——品味书香 诵读经典”线上诵读活动。在活动中，我负责组织协调文化宣传片的拍摄，完成线上诵读活动的作品收集。宣传

片和诵读活动在公众号与抖音发布后，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可以说，我的古籍工作经历虽短，但是足够充实。我抓住了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的尾巴，又在全省古籍保护新一轮十年规划中看到了新的挑战。回首过去的5年，不必说在基层县乡奔波开展普查的辛劳经历，也不必说沉浸在普查新发现的乐趣中而不觉黎明将至，单是能经眼一部好书而带来的收获，都能令我喜出望外许久。每一步脚印，都是一朵莲花。未来，我仍将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古籍保护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让漫漫前路继续见证我的成长。

一颗赤子心，一路走下去

□葛小禾 安徽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愿做傣文古籍保护的守护者

□玉罕为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自从事傣文古籍保护工作以来,我会时不时地陷入思考,我与傣文古籍的相遇,仿佛存在着命运般的渊源。我的爷爷曾是解放后我们村的最后一任帕雅,生前十分注重傣文古籍与傣族文化的传承。我的父亲也从小便跟着爷爷学习傣文和文化知识。1999年,《中国贝叶经全集》整理出版项目启动,我的父亲便在其中负责新、老傣文和国际音标的转写和审核工作。而我在毕业后,就来到了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工作,随后也参与古籍保护。这就像是一种召唤,命运使然。

“从无到有”的见证人

2018年,西双版纳州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同年,西双版纳州政府出台《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土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为古籍保护

工作保驾护航。2019年,成功申请“傣文古籍文献提供中心”公益捐助项目,连续5年,每年获得20万元的经费用于古籍保护。在地方努力、组织认可下,西双版纳州馆古籍保护中心在2020年被评为“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内所藏的《蒂哈尼该》和《版纳景洪田野沟渠志》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是对古籍保护工作者的肯定,同样也是激励。有了资金的支持,从古籍的普查征集、整理翻译、编译出版和数字化建设等环节,都较最初有了很大进展。

我可以说是州图书馆傣文古籍保护“从无到有”的见证人之一,我能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改变是工作时间自发性地延长了,发自内心地

想要做好古籍保护这件事。然后是思维的转变,有人曾问过我:“累吗?”工作量的增加肯定会提升劳累度,但是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始终支撑着自己,它在告诉我“你要好好守护民族文化,守好民族的根”,渐渐地就转换成为了一种使命感。

在实践中提出新思路

西双版纳是傣文古籍收藏量最多的州,除了各文化单位所藏,还有大量的古籍文献散落民间。目前“傣文文献提供中心”项目已经开展到第三年,在向民间普查和征集傣文古籍的同时,我们也在加强数字化资源库建设,最终计划是要实现古籍文献资源数据化,供读者使用。

傣文古籍的保护仅仅依靠我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有以下的计

划:一是加强对外交流,参与国内外会议论坛,学习古籍保护经验;二是加快与高校的合作,引进古籍保护人才,尤其是修复、翻译与数字化建设方面,确保后继有人;三是加深古籍保护方法的研究,从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与传承性保护三元保护理论出发,在实践中提出保护新思路。

如果说生生不息的澜沧江养育了傣家民族,那么古籍所承载的傣族文化则是滋润着精神世界。先人的智慧,就藏在古籍中,沉睡在文字里。我们正学着用温柔的方式,将沉睡的文字唤醒,将她带领至大众视野。我现在也越来越清晰地明白,傣文古籍的保护,不仅是对傣族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共铸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每一位古籍守护者都在贡献着力量。



玉罕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参与州傣文古籍编目、整理,数字化资源建设等古籍保护工作。她是傣族古籍与傣族文化的传承者,也是西双版纳州图书馆傣文古籍保护“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成长在古籍保护事业的春风里

□周余姣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8年春,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我成了古籍保护行业的一名新兵,到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从事古籍保护研究与教学的工作。从那时算起,已算从业有四年了。四年的时间,与资深的从业人员相比,其实还很短暂。

自从投入到古籍保护事业中后,我个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学术转型。此前虽对古籍保护事业有所了解,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但毕竟没有对这个行业实实在在的真切感受。为此,我一边承担《古籍保护概论》的教学工作,一边狠补“古籍保护实践”的短板,努力扫除自己的知识盲区。2018年11月我曾带着6名研究生到扬州古籍线装文

化有限公司、扬州雕版博物馆、扬州大学图书馆等地参观。2021年4月又带着两名研究生到南京图书馆、金陵刻经处、栖霞寺、南京博物院等地考察学习。其他时间,也常常跟随研究院或自己带学生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各种古籍保护相关的专题展览,如“妙手补书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等。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我获得了一个出国访学的机会,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访学,参与“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下该馆古籍目录的编制工作。由于时间太短,这个工作未能全部完成,但于我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锻炼。“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四年来,我想我的学术转型已基本算完成了,也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但要想在这个领域内继续深耕,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所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将学术科研放在很重要的位置。2019年,我们在常务副院长姚伯岳先生的带领下,会同其他单位的专家,一起申请获批了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这个项目的获批,将有利于推动古籍保护研究的发展。同年,我们承办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古籍保护研究》这一集刊,我从该刊第四辑开始担任编辑,并从第六辑起担任编辑部的副主任,目前该刊已出版至第九

辑,第十辑也已组稿完毕。在跟随行业的前辈和同仁从事项目研究和办刊的过程中,也给了我极大的历练,使我对古籍保护事业和研究有了更多的认识。

四年间,我已培养了两名硕士毕业生,现在门下的在读研究生有5位。在我的带领下,我的研究生们对古籍保护事业充满了热爱之情,他们非常愿意为古籍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至于今年的计划,在做好教学工作为古籍保护事业培养更多人才的同时,我希望能能在科研上也能继续取得一点成绩。作为新兵,来路还很长,还须继续努力,我也祝愿我们的古籍保护事业永远沐浴在春风里。



周余姣,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副教授。2018年入职天津师范大学,从事古籍保护研究与教学。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古籍保护研究》集刊编辑等工作。

为所爱奉献青春

□郝婧 天津博物馆

我毕业于河北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在校就读期间,曾多次从参加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牵头的“中华古籍普查志愿者服务行动”,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协助东莞图书馆、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明复图书馆和上海文庙等多家文物保护单位整理古籍善本,在古籍的版本鉴别和著录方面练就了专业功底,奠定了实践基础。从此我与古籍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校期间我积极学习文献学的各种专业知识,曾发表《从锦绣万花谷看宋版书的再生性保护》《佛典目录特点研究》等相关论文,积累相关知识。边学边看,丰富自己的学养。假期一至,我便像一只亟待学习飞翔的雏鸟,申请成为古籍普查志愿者参与到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一次次普查的经验,

我才敢于捧起古籍,谨慎的作出判断。从东莞图书馆到广州省立中山图书馆,从明复图书馆到上海文庙,一个酷热难耐的季节,我们不负所望,完成了两地共537种5252册古籍的著录。再次捧起珍贵的古籍,还是会喟叹,历代不乏藏家以收藏图籍为好,不惜散尽家财,只为善本一册,传承千百年的古籍自有其魅力所在。在普查队伍中,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老师和伙伴,我们以书为友,以学为乐,建立了别样的情谊,并坚信着未来我们都会在祖国各个角落,为保护和传承古籍而各自奋斗。

与此同时,因家学渊源,我本人也非常热爱与古籍修复和字画装裱相关的传统技艺,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在自小接触古籍修复相关的手艺学习

过程中,对于古籍修复流程和技艺均有一定了解。古籍修复与古籍的版本鉴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又是两门不同的学科。自古以来,古籍的修复便是一门以师徒间口耳相传并得以延续的特殊行业,这门技艺强调对修复技艺和理念的把握,若是对古籍相关基础知识有所了解,或有过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经验,学习起来便会更加得心应手。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我现已可独立完成一般性的古籍修复工作,曾修复《五代史补》《南宋集事诗》《武功县志》等善本古籍,效果良好。

自古以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大多是手工艺人,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往往忽视经验总结,技艺的传承大多流于口头和手边,即使是珍贵古籍的修

复也很难形成书面化的文字史料。历史上,曾不乏前人对此著书立说,但多是夸炫装潢之美,不涉技艺之微。这与传统观念对手工业或手工技术固有的偏见有关,使得许多流传至今的古籍修复史料散佚、愈加稀少和凌乱无序,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发掘便迫在眉睫。进入天津博物馆工作后,我凭借对古籍的热爱与期待,在工作之余,依旧不间断自己手中的研究与实践活动。通过就手边资料的整理和归纳,我期待未来有一天,可以为历史上从事古籍修复的前辈们进行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发掘这门手艺背后的历史。就自己所学,找到工作和专业之间的契合点,以期在更好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可以继续为中国的古籍文脉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郝婧,天津博物馆工作人员。多次参与中华古籍普查志愿者服务活动,进行古籍普查。热爱与古籍修复和字画装裱相关的传统技艺,随母亲学习古籍修复,曾修复《五代史补》《南宋集事诗》等善本古籍。

清代廉吏阎敬铭刻书琐记（下）

□范月珍 山西省图书馆

壹

书籍印刷及装帧

信中还多次提到印书用纸、书籍装帧等细节。根据信札和传本所知，阎敬铭所印书一般使用官堆纸和毛太纸，书皮为皮纸，书签为竹纸。

他于某年四月十九日致迺竹：“原信抄寄、批明一切，并印出三样本，此九刀毛太纸印者（旁批：可买得否？官堆似太贵且亦厚，可印否？）属念闻即以此原印之，《穷》分八本或六本，《开》《向》各分四本，每部合价钱若干？稍令有余，以防银钱并作他用。皮纸书皮、装线、不包角，竹写（旁批：刻）书签，印

于书皮，只“时艺向”（旁批：“穷”“开”）三字官堆、毛太印成，各合钱若干？有纸即印卖。”某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迺林和念闻：“五号信言刻《司马集》用六裁堆纸，我意即尽六裁纸用之，不必剩纸，剩亦无用。不如板放微大，书印体面为好，且原书行多字多，亦须如此大。”“如《樗谱》为好，不必《茧谱》，令梧冈先用六裁纸写宋字样子，带京一看。并告至藉，详慎校其原书之字，至要。明年专先刻此书，一气赶成。李相公宋字写一张带京，《稽古录》各书如完，各带京一部。”

光緒十三年（1887）閏四月二十四日致念聞：“解州有九刀毛太紙否？十二刀者，切不可用，以後以毛太印《時藝》，並以毛太印各《格言》零本，若各賣成套之叢書十七種及《傳家集》與司馬公各書。《六藝綱目》仍以官堆印之。《時藝》買者或多，毛太取其價尚，究竟毛太《時藝》一部合銀（旁批：合三部）若干？切實核計，合以足銀能平，不合亦然，且一切書價皆必稍使有餘，不必太緊。以後書局凡經手即賣書人，薪水即出于此，印零部零本亦可合以足銀也。”

肆

阎敬铭刻书目录

阎敬铭所刻书具有典型的清末特点，宋体字，字体方正，版式以九行二十二字为主，大黑口，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书口下多刻“解梁书院”四字。根据传本情况的不完全统计，阎敬铭先后刻印图书 57 种 631 卷，其中有单刻书 28 种 558 卷，丛书两部，收录子书 29 种 73 卷。

单刻本有：清咸丰六年（1856）解梁书院刻宋朱熹撰《易学启蒙》一卷；清光绪元年（1875）解梁书院刻清张之洞撰《輶轩语》七卷；清光绪元年（1875）解梁书院刻清方东树撰《大意尊闻》一卷；清光绪二年（1876）解梁书院刻清张师载辑《课子随笔》二卷《续编》一卷；清光绪二年（1876）解梁书院刻清汪辉祖纂《双节堂庸训》六卷；清光绪六年（1880）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家范》十卷；清光绪七年（1881）阎敬铭解梁刻清路德撰《桎华馆文集》六卷《骈体文》一卷《诗集》四卷《杂录》一卷；清光绪七年（1881）解梁书院刻清马丕瑶编《解州丈清地粮里甲图说》不分卷；清光绪八年（1882）解梁书院刻清阎乃斌撰《怡静斋诗钞》一卷；清光绪八年（1882）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书仪》十卷；清光绪九年（1883）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涑水纪闻》十六卷；清光绪九年（1883）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稽古录》二十卷；清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四年（1891）山东刻清路德撰《时艺开》十二卷《时艺向》十二卷《时艺穷》十七卷；清光绪十三年（1887）长沙刻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释文辩误》十二卷《外纪》十卷《目录》五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阎敬铭辑《福永堂汇钞》二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解梁书院刻三十二年（1906）正本堂重印明徐祯稷撰《耻言》一卷；清光绪十四年（1888）解梁书院刻三十二年（1906）正本堂重印清申涵光撰《荆园小语》一卷《荆园进语》一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解梁书院刻清姚培谦撰《春秋左传杜注补辑》三十卷首一卷；清光绪十六年（1890）解梁书院刻宋程颐传《周易传义音训》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解梁书院刻河东道署重印清马丕瑶撰《蚕桑简易法》一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易说》六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宋司马光撰《司马文正公年谱》一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清李毓秀撰《弟子规》一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二语摘读四

言》不分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清曾国藩撰《求阙斋语摘录》一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元舒恭注《六艺纲目》二卷《字原》一卷《札记》一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宋范祖禹撰《唐鉴》十二卷；清光绪解梁书院刻南朝梁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续千字文》一卷《广千字文》一卷《广千字文注》一卷。

丛书两种为《解梁书院丛刊》十四种和《有诸己斋格言丛书》十七种，两部丛书信札都有提到，只是前者未见传本。山西省图书馆藏《铜鞮吴氏藏书》稿本有记载，收录子书有：《求阙斋语摘录》《宰嘉训俗》《朱子语类日钞》《呻吟语节录》《庭训格言》《初学备忘》《耻言》《荆园小语》《荆园进语》《樗茧谱》《輶轩语》《训子语》《六艺纲目》《大意尊闻》。《有诸己斋格言丛书》流传较多，子目有：《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朱子语类日钞》《呻吟语节录》《耻言》《荆园小语》及《荆园进语》《宰嘉训俗》《张杨园训子语》《张杨园初学备忘》《课子随笔》《聪训斋语》《双节堂庸训》《教谕语》《弟子箴言》《大意尊闻》《求阙斋语摘录》《輶轩语》《涑水纪闻》。两部丛书所收子目重复度比较高，除相同部分外，前者较后者多《樗茧谱》和《六艺纲目》两种，少《课子随笔》《聪训斋语》《双节堂庸训》《教谕语》《弟子箴言》和《涑水纪闻》六种。两部丛书都是新刻书加汇印单刻本而成的，做法是凡收入丛书者，装帧时外皮和书签要保持一致。

阎敬铭所刻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儒学和乡邦著述，如司马光、李毓秀等人的著作。二是阎敬铭亲友的著述：如《桎华馆诗文集》《任在堂三编》（《时艺开》《时艺向》《时艺穷》）《怡静斋诗钞》和《福永堂汇钞》，其中《桎华馆诗文集》《任在堂三编》是阎敬铭在关中书院求学时的恩师路德所著，解梁书院版《桎华馆诗文集》也是路德诗文集第一次结集刊印；《怡静斋诗钞》是阎敬铭侄子阎乃斌所著；《福永堂汇钞》则是阎敬铭本人辑录。三是应时实用的农桑书籍，如《蚕桑简易法》《解州丈清地粮里甲图说》。这两部书的作者是时任解州知州的马丕瑶，其中《蚕桑简易法》还由河东道署进行了重印。

阎敬铭作为清末廉吏受后人所关注，而他十分看重的刻书事业却不为人所知，信札和传本文献不仅让阎敬铭的刻书事业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也为清代书史和版本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完）

貳

刻书资金与图书售卖

阎敬铭图书刊刻所使用的经费来源较多，有自己的生意盈利、有公项银、有书局和桑局银、有乡绅捐助。他刻印的图书主要用于售卖，也供解梁书院师生使用，图书售卖及盈亏皆由阎敬铭承担。由此来看，他刻书采用的是与书局、书院合作经营模式，这种模式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是清末官书局、书院刻书商业化的一个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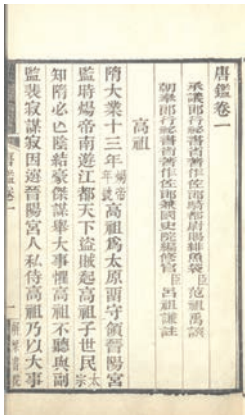
光绪十一年（1885）冬至，他写信致迺林：“明年，想会运城公项银（旁批：零星会）至京或径会长沙，即用刻《曾文正集》者。刻《通鉴》事有几分可定？”

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四日致迺林：“去冬定议在长沙刻《通鉴》，一切如《曾文正集》，每百家连校对一切制钱一百六十文，今春开工，二年可完。”同年四月十九日致迺林：“与刘梧冈商刻《时艺开向穷》三编，仍用书局银，板仍归解梁书院。”“在湖南开刻《通鉴》，我已垫付银二千，以后当须缓为付之。”

某年二月初一致迺竹：“书局存家之项必与念闻对明数目（旁批：对清告我），以便我之备还。”某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迺林和念闻：“运城利银四百八十两可收回，作来年刻书用。《司马集》每卷后刻校书人姓名，原捐八千，刻资各字号、东家、县，分姓名，念闻详查问，开来为要，专此再告。”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致迺林，说到叶田五借钱，手头比较紧时，令其“刻书速售，大赔本中，此事又得吃亏数十两。”某年某月初一致迺林：“雷、李写《双节堂》样本，宋字。每百本二十文，出桑局帐。”

光緒十三年（1887）正月十一日致迺竹：“运城盐号刻书之项，以二千七百之利归吾家家用。”“吾付湖南刻《通鉴》银二千两，又付山东刻《开》《向》《穷》银七百两，此板亦付解梁。此可与念闻找算清白。”“捐刻书者姓名收到九个，应再查者，随后告你。”二月十六日致迺竹：“与念闻信言刻《时艺穷》事，你细看后付，而与之妥计。”“去年兑湖南刻《通鉴》银二千，一年刻，归家。兑山东刻《开》《向》《穷》七百两，冬三月，利归家，你与念闻是否为此核算？今年春问历次兑交（旁批：已交清）湖南刻《通鉴》银四千两（旁



批：即告念闻）。”十月十八日致迺竹：“家欠桑局、书局之项，银还银，钱还钱，缘刻工未停，一切仍用钱，不必倒换，即告念闻，念闻信谓买书钱不必还，此极不可，必分文还结，免出利息，可告众绅。”腊月十七日致迺竹：“存余若干，暂存，仍作明年刻书用。念闻谓刻书不能停，明年刻工不停，念闻万不能置身事外。”“书局刻工不能停（旁批：刘亦大滑），至为不便。你既来京，念闻就馆，无人校字督工，然仍必念闻是待。至开春，湖北送《通鉴》板书各事，详念闻函，你若早来京，而板书未到，即详告念闻。吾于《通鉴》，今年先后又垫兑一千两。”

叁

子女教育时提到的书

阎敬铭选书刻书多以经部的儒学和小学类图书为多，应科举之需和书院用书，也常用以教育子女，督促子孙学习。

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二十一日致迺林：“你立身应照《宰嘉训俗》《聪训

斋》二书，时时体行，足以善人矣。”

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十六日致迺林：“汝病间时必逐日看读《四书》《诗》《书》《易》数叶，周而复始，以《课子随笔》《弟子格言》《解梁丛

书》为阶梯。”

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十九日致迺竹：“《格言》十七种皆讲世故物情也，常点阅深思。”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迺竹：“经书不可不常读，《格言》不可不常阅。”